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人纠葛与历史运演:西汉儒家历史观的现代诠释 张秋升著 张秋升著 援—济南:齐鲁书社, 2006.12

阳景苑—缘—载

I 天援援 II 张援援 III 儒家—研究—西汉时代
IV 用用用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0000 号

天人纠葛与历史运演
——西汉儒家历史观的现代诠释

张秋升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猿号 邮编:猿猿猿猿)

张秋升著 张秋升著 张秋升著 张秋升著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猿猿猿猿 猿猿猿猿 猿猿猿猿 猿猿猿猿 猿猿猿猿 猿猿猿猿

猿猿猿猿 猿猿猿猿 猿猿猿猿 猿猿猿猿 猿猿猿猿 猿猿猿猿

猿猿猿猿—猿猿猿猿—猿猿猿猿—载

运猿猿 定价:猿猿猿元

第一章 引论.....	员
一、历史观的涵义	员
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圆
三、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缘
四、本书的构想	愿
第二章 西汉儒家重视历史	园
一、西汉儒家的历史价值观.....	员
二、西汉儒家著述的重史特色.....	苑
三、司马迁的历史价值观及其著述特点.....	园
第三章 变动不居——历史的普遍现象	源
一、对历史变动的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	源
二、历史变动的阶段性.....	源
三、司马迁论“变”与“敝”、“变”与“终始”之关系	缘
第四章 历史变动的趋向与形式	源
一、历史变动的趋向.....	源
二、历史的量变、质变及其呈现形式	愿
三、司马迁论“变”与“循环”、“变”与“积”之关系	愿
第五章 天与历史	愿
一、天人关系思想的类型.....	愿
二、历史领域里的天人关系思想	员

三、司马迁天人关系思想之推测	页四
第六章 人与历史	页四
一、主体与历史的关系	页四
二、主体的创造物与历史的关系	页五
三、另类声音——《淮南子》论人与历史之关系	页四
第七章 西汉儒家对“历史规律”的追寻	页四
一、变动历史中的不变者	页四
二、董仲舒“道”之考辨	页五
第八章 西汉儒家历史观的基本特征	页四
一、历史主要指政治史	页四
二、多种因素支配历史	页四
三、人文主义色彩浓厚	页四
四、君主史观、道德史观凸显	页四
附 主要参考文献	页四

第一章

引 论

一、历史观的涵义

人组成了社会,社会的变迁展示为历史,人对社会历史谈论、描述、思考、研究,自然展现或直接提出自己的认识结论,就产生了历史观。历史观古已有之,历史观的概念则属后起,弄清历史观的确切涵义,直接关系到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和范围。本书采取一般的说法,认为: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回答的问题是:社会历史的性质和起源怎样,社会历史整体或某一方面是不是变动的,变动是否有阶段性,变动的趋向和形式如何,变动的原因是什么,变动有无规律等等,凡对上述所有问题、某些问题或某一问题发表的见解,都是历史观的内容。简言之,历史观回答的是社会历史的存在、变动、动因、规律等问题。历史观既属史学研究的范围,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属于哲学领域中与自然观、认识论相并列的三大块之一,所以人们又称之为历史哲学,并常将历史观和历史哲学二词通用。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历史哲学特指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历史观,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不是从客观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发现历史的内在联系,而是让客观历史事实牵就他的思辨理论体系。历史哲学一词的内涵又处在演变之中,人们一般将

19世纪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等称作思辨的历史哲学,将克罗齐、柯林武德、波普尔等人的史学理论称作分析的历史哲学,后者已不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与思考,而是关于历史认识或史学本身的理论。鉴于历史哲学一词的多义性,本书不使用历史哲学一词来涵盖西汉儒家对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历史观所关涉的问题是社会历史的一般性问题,这一本质特点决定了它不是对社会历史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对社会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由专门学科来承担。但当这些具体研究及其结论同历史观的一般性问题发生了联系,由社会历史的具体方面说明或解释了社会历史的存在、变动、动因、规律等一般性的问题时,这样的研究和结论就具有了历史观的特征。

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历史观因时代不同会有差异,但也会因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结构的相似而差异不大。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观形形色色,西汉学者因封建大一统需要而将封建社会的历史观基本定型,后世封建学者则大多相沿不改,而西汉学者的历史观又以西汉儒家的历史观为代表。

先秦时期,人们在观察思考自然的同时,十分重视观察社会现象,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观点。如:老子的道德退化论;孔子的礼乐损益、百世可知的历史变化观;《管子》的经济生活决定人们道德风貌、社会治乱、政权兴亡的认识;孟子的治乱交替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盛衰论,以及仁政思想、民贵君轻的思想;荀子的社会起源论、天人相分论、法后王的观点,礼维系社会稳定的思想;商鞅的上世、中世、下世的三世进化说;韩非的上古、中古、近古三世进化论;邹衍的五德终

始历史循环论,纵横家的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历史的观点;《易传》中穷则变、顺天应人而革命、以天道定人道的思想,以及对人类社会早期演变过程的描述;《吕氏春秋》中的天人感应思想等等,可谓丰富多彩,涉及的历史内容也十分广泛。从总体上说,先秦学者的历史观几乎确定了我国古代历史观的全部基本范畴,但因未有统一的封建国家出现,因而也没有一统的历史观或基本一致的思想倾向。对这些理论和观点“加以改造使它们更能为封建统治服务,并反映于史学著作,需得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之后,才能成为现实。”(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第12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取得长久统治的封建王朝,从社会政治到思想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并得到巩固,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西汉奠定了后世封建政权的基本模式。在长达二百三十年的时间里,西汉王朝历经兴治乱亡各种情况,使封建制度在治理面积辽阔、民族众多的一统国家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基本显露出来,不同时期的现实状况激发着儒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历史,加以西汉统治者一向比较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促使西汉儒家时时关注历史、谈论历史、思考历史,提出自己对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他们或提出新的见解,或将先秦学者的相关论述加以深化与推进:陆贾将历史划分为先圣、中圣、后圣三大阶段,对人类社会早期演变过程的描述比先秦学者更为清晰,他还将道德仁义决定历史提升为“历史规律”;贾谊将民本史观推向深入,董仲舒继邹衍五德终始说之后,创立三统说,并强调天人感应和君主史观;司马迁奠定了反映封建社会结构的纪传体史书模式,并对历史的变动作了贯通的、全面的认识,他的经济决定道德及政治的思想较前人也更为深

刻,而且还将地理环境影响历史变动的观点推向深入;刘向将天人感应学说系统化,并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他还关注了妇女对历史变动的作用;刘歆则在其父刘向的基础上创立了五行相生的历史循环论;扬雄理性地认识到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历史,明确提出历史延续的形式为“因革”,并淡化了天意史观。这些都是西汉儒家历史观中的荦荦大者,也是很有特色的地方,是较先秦学者历史观进步的重要表现。

西汉王朝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历史观便颇具封建社会历史观的模式意义。从总体上讲,因封建统治需要,西汉儒家对先秦学者的历史观进行了筛选,逐渐定下了封建社会天意史观、君主史观、道德史观的基调,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基本上划定了中国封建学者历史观的疆界,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有的延续千年之久,他们所提出的概念、范畴为后世反复使用,虽然后世学者在历史观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所深入,取得了一些思想的突破,但大体无能出此樊篱。因此,西汉儒家的历史观就不仅仅是中国历史观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而且可以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观的代表。选定西汉儒家的历史观作为研究对象,对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全部历史观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认识历史与认识自然一样,只要认识的对象没有消失,认识就永远不会中止,认识历史的观念成果之一——历史观,因而便是人类历代都有、并将永远存在下去的东西。总结西汉儒家的历史观,对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也不无裨益。所以,研究西汉儒家的历史观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对封建学者历史观的研究,应该从梁启超说起。1902年,梁启超开始清算封建史学,认为其第一弊端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新史学·中国之旧史》,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这已触及封建学者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1918年,李大钊在其《史学思想史讲义》的首篇《史观》一文中,将以往的历史观归纳为“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等等,并指出,“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可惜二人的研究都是定性式的研究,均未对封建学者的历史观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时至今日,仍未有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观的专著,而对西方同时期历史观研究的专著至少已有两部(陈耀彬、杜志清著《西方社会历史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何怀远著《欧洲社会历史观:从古希腊到马克思》,黄河出版社1995年版)。相对来说,当代著名学者方立天的研究尚算详细,在《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他专列《中国古代历史观》一章,论述了自老子至王夫之的历史观,但这毕竟是整部著作中极少的一部分,在五十八万字的全部篇幅里,只占了五万余字的分量。断代的专门性研究著作几乎也没有,台湾雷家骥《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可勉强算作此类专著,但该书的侧重点在史学和史学观念上,就历史观的有关内容而言,又侧重于天意史观和历史循环论,因而是全面

的。

具体到西汉儒家历史观的研究,其研究状况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观的研究状况大体一样。概而言之,其不足之处约有两点:一是不全面、不贯通;二是有些问题有待深入探索,有些问题越搞越乱,需要澄清。

第一点的主要表现是,长期以来的有关研究,往往只注重董仲舒和司马迁两人,对西汉其他儒者研究薄弱,表现出个案研究选择上的偏颇。回顾对此问题研究的历程便可看出这一不足。1959年,顾颉刚发表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后又出版了《汉代学术史略》(上海亚细亚书局1959年版)一书,对汉代的五德说和三统说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探讨。冯友兰于1959年发表《秦汉历史哲学》(载《哲学评论》第六卷第二、三期)一文,指出“在中国哲学里,历史哲学,在汉代可以说是最发达。”该文对五德说、三统说、公羊三世说进行了深入剖析。另外,魏应麒在《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中列有《五德终始说下之历史观及其影响》一节。可见,他们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五德说和三统说上,重点论述的当然是董仲舒的学说。顾氏研究面还稍宽,涉及到了刘歆的五行相生的历史循环论。研究司马迁及《史记》的学者,大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司马迁的历史观或历史哲学,有代表性的是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开明书店1956年版)一书,书中列有《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专题。此外,一些中国哲学史和史学概论的著作中,零零星星地涉及西汉儒家的历史观,但往往只限于董仲舒和司马迁二人。解放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对西汉儒家历史观的个案研究有所增加:如孙叔平的《中国哲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除论及董仲舒的历史循环论外,又增加了扬雄的有关内容。方立天选择的个

案研究最多,有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但对西汉末年儒者不论,而且对四位儒者的论述也过于简略,总文字量还不到九千字。雷家骥一书中的西汉部分对陆贾、贾谊、扬雄只略有涉及,对董仲舒、司马迁、刘向、刘歆父子论述较详。这一时期,人们仍然偏重对董仲舒、司马迁的研究,这不仅表现在上述研究者垂青二人,而且中国哲学史、史学史、史学概论的教科书或专著里大都特别关注他们二人或其中一人的历史观。此类代表性的专著有周桂钿的《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华友根的《董仲舒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年版);白寿彝的《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 1984年版),张大可的《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陈桐生的《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等等。另外,有关二人历史观的单篇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造成这种研究失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或历史观内容极为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儒者的历史观不值得探讨,况且董仲舒、司马迁二人的历史观与西汉其他儒家的历史观有着渊源或影响的关系。不全面选择西汉各期儒者进行贯通的研究,必然反映不出整个西汉一代儒家历史观的整体风貌。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庞天佑于 1994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全面论述了秦汉时期的历史哲学思想,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其中涉及西汉儒家历史观的内容相当丰富,但是仍然遗漏了某些儒家代表人物,如安作璋在序言中所提到的刘向;另外,本书因涉及历史时限较长,论述的问题又较多,所以,有些地方的论述还有深入的必要。

就第二点不足而言,虽然对西汉儒家历史观的个案研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贾谊具有进步

的民本史观,董仲舒的三统说、刘歆的五行相生说是历史循环论;司马迁有从经济角度说明历史变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等等,但是,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陆贾、刘向、扬雄的历史观属研究的薄弱环节,需加大研究力度;贾谊民本史观以外的历史观点也不可忽略。另外,有些问题越搞越乱,亟须理清。比如对司马迁天人关系思想的认识就存在迄今为止仍未解决的问题。究竟司马迁相信天命、反对天命还是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又如关于董仲舒所说的“道”究竟是不变的还是可变的等等,类似的问题都是关于西汉儒家历史观的大问题,需要给予清楚的回答。

四、本书的构想

本书意在对西汉儒家的历史观作专门的、全面的、贯通的研究。基本做法是:从原始材料出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比较的方法以及哲学史和史学史研究中的其他相关方法,选取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刘歆父亲和扬雄等西汉儒家代表人物,先进行个案研究,然后打破个案,以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为主线,对西汉儒家的历史观作全面系统的论述。全书除引论外共分七章,首先论述西汉儒家历史观发生的前提——重视历史,然后对历史观涉及的几个问题——加以阐发:西汉儒家对历史变动的认识,对历史变动趋向、形式的探索,对历史动因的思考,对历史规律的追寻,最后,对西汉儒家历史观的基本特征进行归纳。在论述的过程中,尽量将不太有名的儒者,如贾山、韩婴、徐乐、《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以及谷永等人有关历史观的重要论断吸收进来。对先秦学者相关问题的重要论述和观点将随时溯源,与西汉儒家的有关

认识进行纵向的比较 ;将道家著作《淮南子》、法家人物晁错等人的观点和认识加以论述 ,以进行横向比较 ,由此希望对西汉儒家的历史观有合理的定位及深入的理解。

第二章

西汉儒家重视历史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楚元王传·赞》中写到：“自孔子之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这段话概括了孟子、荀子及西汉四位儒家代表人物的学养，道出了他们著述的社会价值。“博物洽闻”说明了他们知识的渊博，而“通达古今”则指出了他们对历史的通晓与熟知。虽然班固在这里只是评价了西汉的四位大儒，但却引发了我们对西汉儒家学术特色的关注。广泛考察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那就是西汉儒家普遍重视历史，虽然有人还谈不上对“古今”的“通达”，但他们的言论和著述往往有着鲜明而浓重的史的特色，朝堂对策、上书论事、著文言理，常常回溯历史，以史为据，结合历史而发论，甚至还有不少儒者专门研究和撰写历史。他们似乎与历史有着一种天然情缘，对历史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看法，构成了他们的历史观。当然，他们所针对的历史内容有所不同，历史认识水平有高低之分，对历史现象的理性抽象程度也有差异，甚至相同观点的表述也不一样，不过，差异之中，又有相通和相似之处，更有大体一致的认识倾向，这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正展示了西汉儒家历史观的丰富性和统一性，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系统地探讨和

研究。

重视对历史现象的思考、具备历史知识,是历史观发生的根本前提条件,很难想像,一个对历史不屑一顾、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能有自己的历史观。因此,本章首先对西汉儒家重视历史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一、西汉儒家的历史价值观

人们之所以重视历史,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历史的重要价值,因而,我们首先论述一下西汉儒家的历史价值观。历史价值观是人们对历史的作用和功能的观念认识。西汉儒家的历史价值观,有的被明确表述出来,有的则体现在言论和著述中,前者是对这种观念认识的理性把握,后者则是不自觉的意识。从总体上看,西汉儒家历史价值观的核心是以史为鉴,同时也包括以史教化、以史察理明道的观念在内,但后两者不太突出。

宋代的洪迈曾经对历代史鉴作过总结,涉及西汉的内容有:“汉祖命群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项氏所以失天下,命陆贾著秦所以失天下,张释之为文帝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贾山借秦为喻,贾谊请人主引商、周事观之。”(《容斋随笔·前代为鉴》)实际上,西汉儒家以史为鉴者远不止这些。

史鉴观念在先秦就已经出现,秦始皇力图斩断历史,超越历史,焚烧《诗》《书》及历史著作,禁绝师古,因此,就谈不上以史为鉴了。史鉴观念在汉代的复兴始于汉初的陆贾。陆贾(约公元前 206 年—公元前 180 年),楚人,跟从汉高祖平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他亲身经历了亡秦灭项、诛吕保刘等重大历史事变,文化素养较高,历史知识丰富,常常称说《诗》、《书》,著有《新语》和《楚汉春秋》。汉初定天下,刘邦曾对群臣发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所以失

天下者何？”(《史记·高祖本纪》)虽然还只限于对自身成功经验和项羽失败教训的总结,但已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埋下以史为鉴观念复生的种子。到了刘邦晚年,他命陆贾撰写历史,则表明他对历史已有浓厚的兴趣,也显示了他已具有自觉的史鉴意识。《史记·酈生陆贾列传》记载了陆贾撰写《新语》的缘起: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怩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显然,反思总结历史是汉高祖刘邦给陆贾的一个任务,反映了刘邦想从秦及更久远的历史中求得国家成败存亡经验教训的愿望,标志着汉代最高统治者开始重视历史,也从侧面说明了陆贾对历史的熟悉,还透露出此书的大体内容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所以陆贾的命运与秦朝的淳于越完全相反,淳于越因进言秦始皇“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主张向历史学习,而落了个以古非今的罪名,从而导致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陆贾以史开导刘邦,从而获准总结历史,撰写《新语》,并诵读于朝堂之上,实开汉代重史以至重儒的先声。虽然陆贾在这段话中并未明确提出以史为鉴,但他以商汤、周武王、夫差、智伯以及秦王朝的成败立论,本身就包含了以史为鉴的意识,而在《新语》一书中,则有着史鉴观念的明确表述。他认为,历史“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新语·

至德》),《春秋》就是一部“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新语·本行》)的历史著作。他主张谈论历史应与现实结合起来,“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言远者考之于近”(《新语·术事》),做到古为今用。这些表述未必全是陆贾的创造,但无疑表明,他对历史的价值已有理性的把握。

陆贾以后,西汉儒家重史观念和史鉴观念日益加强。稍晚于陆贾的贾谊,言谈著述更是注重历史,对历史的价值有了更丰富具体的认识。贾谊(公元前 200 年——公元前 169 年),洛阳(今属河南)人,十八岁时,即“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汉书·贾谊传》),受到河南郡守吴公的赏识,成为其门生。汉文帝初年,被召为博士,一岁而超迁为太中大夫。他力主改革,“以为汉兴三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汉书·贾谊传》)文帝谦让未实行。他多次上书言事,受到周勃等朝中大臣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又为梁怀王太傅。他三十三岁就已离世,但留下了许多著述,除《吊屈原赋》、《鹏鸟赋》等赋作外,其他著述都保留在《新书》中。

在历史价值观方面,贾谊首先把是否借鉴历史看做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夫殷周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是不法圣智也。秦之亟绝者,其轨迹可见也,然而不能避,是后车又覆也。夫存亡之反,治乱之迹,其要在是矣。”(《新书·保傅》)即存亡治乱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对历史经验教训的“从”与“避”,这强烈表达了以史为鉴的思想认识。其次,历史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他认为,对太子的教育不能缺少历史知识,“教之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使知废兴者,为戒惧焉。”“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新书·傅职》)贾谊的这一表述虽然是照搬了《国语·楚语上》的话,但也

说明他对此观点的赞同。再次,贾谊还力图探索历史变化的道理,从更高的层次上指导现实。他说:“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新书·过秦下》)“察盛衰之理”显然比以史为鉴和以史教化更深入了一步。

“为世纯儒”(《汉书·叙传》)的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是西汉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以研治《公羊春秋》闻名于世,治学刻苦,“三年不窥园”(《汉书·董仲舒传》);“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七引《邹子》),为汉景帝时博士,武帝继位,策问贤良方正之士“天人之故”、“古今治道”,董仲舒献对《天人三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曾为江都相,一度因言灾异而下狱,后为胶西相,晚年家居,修学著书。董仲舒当时已为学术领袖,“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著述甚丰,“皆明经术之意”(《汉书·董仲舒传》),留存至今的著述主要有《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董仲舒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他适应汉帝国的时代需要,以《公羊春秋》作为学术基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了阴阳家、法家、名家等许多思想材料和理论成果,创立了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儒学体系,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甚为巨大。他同样对历史极为关注,对历史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其历史价值观主要通过他对《春秋》一书功能的认识体现出来。首先,董氏认为《春秋》是一部全面反映春秋时期历史的著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春秋繁露·十指》)其次,他认为孔子修《春秋》的目的是“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春秋繁露·俞序》)他还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